

渊藪地

海归光影: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摄影家金仲廉

陆 剑

甲辰仲秋，一批已有百年历史的珍贵摄影原照，从海峡的那头飞到千里之外的江南小镇，回到这批作品拍摄者的老家。它们的年纪非常大，最早的摄于120年前（1902—1905年之间），最近的不会晚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数量足有几十张之多。尤其难得的是，这些作品拍得相当专业，可以说是行家里手，而且照片上大多有作者“zung loeh.king”的英文签名和“仲廉”“东溪”等中文印章，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仲廉”“东溪”之名也许大家还不太熟悉，但若提起他的长兄——20世纪初年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金北楼（金绍城、金巩伯），他的四弟——近现代竹刻艺术大师金西厓（金绍坊），他的外甥——我国文博泰斗王世襄，他的表弟、近现代摄影艺术大咖刘旭沧，那么文化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海归精英

金仲廉（1880—1965），名绍章，字仲廉，号东溪，又名王森，英文名“zungloeh.king”，晚清秀才、贡生、分省试用知县，我国清代留学先驱、买办、实业家、民国时期著名竹刻家。清光绪六年(1880),金仲廉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一个富裕的丝商家庭。他的祖父金祠(字竹庭,1820—1887)在上海开埠后,自学洋泾浜英语,成为上海滩首批“丝通事”(从事蚕丝对外贸易的翻译),并因经营“协隆”丝号而发家致富。其父金焘(字沁园,1856—1914)是位开明士绅,醉心西学,尤其重视子女的教育。1902年,经盛宣怀奏报,清廷批准,金仲廉与长兄金巩伯、三弟金叔初一起被父亲送往英国留学,入伦敦国王书院习机械工程。在英国学期间,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他常去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参观美术馆、博物馆,为了深入获取实际的工程经验,他还进入伯明汉姆的通用电气公司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习。

1905年，25岁的金仲廉学成归国，途径大西洋、北美、太平洋、日本……顺道做了环球旅行；1906年，他陪同父亲金焘周游欧美各国，购回不少西方工业产品（如望远镜、显微镜、八音盒、自鸣钟、洋枪等）；不久，又随汪大燮出洋并担任译员；1907—1908年回到浙江，服务于刚创立的浙江铁路公司；1910年还参加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任机械审查官。

进入民国后，金仲廉从商，担任上海美商慎昌洋行买办，并自创金氏工程公司和大兆公司（贸易行），主要承揽铁路、有轨电车、港口等工程项目，并把英国的产品运到中国来销售。为了和国外的重要工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两度出访英国，成为数家海外知名公司的代理人，包括Cal-lender 电缆和建筑公司，Dick Kerr & Company 和 J.G.White & Com-pany 等，并且他在1914年成功获得了英国A.M.I.E.E文凭。

上世纪20年代，他举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把工作重心专向金融和文化事业。商业方面，他担任北京麦加利银行“中国经理”；还与儿女亲家、实业家、收藏家蒋汝藻等集资10万两，在北京开设裕丰钱庄；投资天津仁立毛纺厂，并担任大股东。文化方面，他与亲属合股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博温斋”古玩店，赞助杭州西泠印社等文化团体，并担任北京欧美同学会会长、东方绘画协会中方代表、中华书局股东等。可以说，他是一位典型的“海归”儒商。

金仲廉的另一面则以刻竹名世，是民国时期名重南北的竹刻名家，与吴昌硕、郑孝胥、严复、齐白石、胡适等文艺界名流过从甚密。据《竹人续录》记载：“他能书画，精竹刻，精细而有法度，所刻各家墨迹均极其工妙，尤擅阳文山水花卉，技艺不在周芷岩之下”。他的作品当时很受文人欢迎，北京和上海的扇庄都有定点代购他的作品，且润例颇高。据说，他擅刻扇骨，当时值二两黄金一片，而他刻的臂搁则与一幅名家的字画不相上下。他一生创作的竹刻逾百件，作品散见于《湖社月刊》《中国美术年鉴》（1948年）、《竹刻艺术》等刊物，并有《竹刻说》（1932年）、《可读庐竹刻拓本》（1924年）等著作行世。

1948年，金仲廉迁居我国台湾省。1965年在台北去世，享年86岁。1987年，他的长子、中国石油事业奠基人金开英将他的部分竹刻作品（20余件）及吴昌硕所题“东溪刻竹”真

迹等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台北当地的博物馆永久保存。

摄影先驱

与家族的其他兄弟一样，金仲廉多才多艺，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竹刻家，还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摄影家。

有资料表明,金仲廉从小就接触了摄影,并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恐怕还是源于家族的影响。前文已述,金家是富裕的丝商家庭,其祖父从事对外贸易,与洋人多有接触,较早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西方的文明。而他的父亲金焘又对西方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摄影。为此,金焘不仅购买了多部相机和全套冲印设备,还于1883年前后在南浔家中设置了暗室和照相机,这恐怕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家庭摄影工作室之一。近年屡次在影像拍卖上出现的一帧南浔金氏承德堂的旧影极有可能出自他之手,而相片中金宅室内摆放的数张南浔风景照片大概率也是他的习作。据金仲廉的长子、中国石油



1902年金仲廉留学英国时的证件照



1930年代,金仲廉(中间持相机者)与摄影爱好者合影(右一为摄影大咖刘旭沧)

事业奠基人金开英晚年回忆:“我们家里有一个照相间,那是因为我祖父很喜欢照相,我们曾把家里的大门和大厅、二厅、三厅的门都打开,照过一张相,从外面看进去,整栋房子好深好远,因为先祖父喜欢照相,所以他和上海时报馆里的照相经理唐镜元先生很熟”(见《金开英先生访问记录》)。有了这样的家庭背景,金仲廉接触摄影艺术的时间极有可能发生在19世纪末,地点在他的老家南浔,而他的启蒙老师也许就是他的父亲金焘。目前能见到金仲廉最早的摄影作品,是其在留学英国时期所摄（1902—1905年,当时才20岁出头),以欧洲的城市、乡村风光和人物为主,数量有30张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批照片中,不仅有他自己拍的照片,还有数张其兄弟的摄影作品。很明显,尽管有紧张的学业要完成,但共同的爱好——摄影占据了金氏兄弟不少的闲暇时间。

以这张《渔船》为例（见右上图，曾现身2024年中贸圣佳——“又见”影像专场拍卖会），据学者考证，拍摄时间为1904年，记录了英格兰康沃尔郡的一个码头旁的帆船。照片画面精美，构图巧妙，艺术感极强。可以窥见金氏对于艺术与人文的天赋与造诣。照片由“碳转移印相”工艺制成，尺寸为12.5×8cm，照片下方有作者用铅笔书写的标题“福伊”和“zung loeh.king”的英文签名以及“玉森”的朱文印章，原底洗印，品相完好，是极为罕见的中国人早期拍摄海外风景的艺术摄影作品。据英国当地报纸报道，1904年春金氏兄弟通过特别许可，参观了德文波特港口的皇家海军设施和船只，照片上标注的“福伊”位于德文波特以西25英里处，金氏兄弟极有可能利用他们在德文波特海军码头的官方访问机会，拍摄了英格兰西区的更多风景（此批照片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而根据英国皇

家摄影学会（RPS）的记录，金仲廉和他的哥哥金巩伯（金绍城）早在1904年，就被英国皇家摄影学会接纳为会员，成为加入该协会的第一批中国人，金氏兄弟还曾向RPS图书馆捐赠了几件中文签名的摄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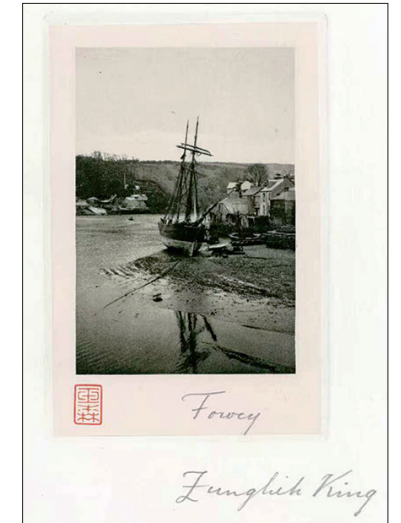
又如这张名为Reflection（倒影）的作品（尺寸为：190×252cm），精心装裱，品相完好，不但有英文签名，还有中文印章，想必也是作者的得意之作。欣赏这幅作品让人联想起当下世界上最贵摄影作品之一——画意摄影大师爱德华·史泰钦于1904年创作的《池塘月光》，而金仲廉的这幅作品也创作于1904年前后，两者都是画意满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金仲廉以东方人视角与艺术修养，运用林间的自然光线、淡淡薄雾和如镜的水面营造了一个安宁、恬静的画面。这幅作品融汇了东方人的审美意趣，疏密结合、虚实相生，具有“疏影横斜水清浅”的诗情画意。

学成回国后，金仲廉对于摄影的兴趣依旧持续，不仅参加了1910年上海的摄影展，1928年天津、北京的摄影展，还参与了中国第一个业余摄影家艺术联盟——北京“光社”的创建与早期活动。

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金仲廉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从现存原版照片来看，主要是江浙、北京、山西、山东、陕西等地的风光照为主，尤以杭州和北京的照片居多，其中杭州的部分以自然风光——西湖等为主，北京的部分以名胜古迹—故宫、天坛、颐和园、北海等为主。据《北洋画报》第557期评论道：“金仲廉君之《断家桥》、《苏堤》、《渔村》等章法极佳，可谓善于取景”。

以这张《残雪》为例，记录了杭州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断桥残雪”的美景，拍摄时间为1924年冬，从拍摄角度看，应是从杭州宝石山山脚俯视西湖。远处的杭州城墙与门楼清晰可见，湖面水平如镜，而断桥在画面的

归”摄影家群体,在中国近现代摄影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个案。



金仲廉1904年拍摄的《渔船》



1928年《银色的西湖》上刊登的金仲廉作品一《残雪》



金仲廉摄《倒影(Reflection)》



金仲廉刻竹臂搁

结 语

此次由金仲廉曾孙金宏毅先生，将保存了一个甲子的先人（金仲廉先生1965年去世）摄影原作从台湾跨越海峡带到大陆，意义非凡，更具研究价值。

这批历史原照总量约60帧，内容丰富，尺寸较大，制作精良，内容涉及风光、建筑、人物。年代横跨1900—1930年代，一半以上系金仲廉1902—1905年留学英国时所摄，材质囊括了银盐、蛋白、碳转印等各种印像工艺，是一批不可多得的中国早期摄影作品实物史料。

事实上，摄影技术发明之后，尽管早在1842年就已传入中国，并在广州、上海等城市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影楼，从而形成了一批摄影从业者，但直到清代末年，真正从摄影艺术的角度开展摄影创作的中国本土摄影家却极其少见。民国之前，我国风光类摄影作品大多为外国摄影师拍摄，更多是作为影像资料的形式被发现、保存和使用，价值更多体现在其档案和史料价值上，而中国摄影师赴国外拍摄留存的历史原照更是凤毛麟角。

从以往的资料和作品分析，在中国把摄影作为一门体现拍摄者思想、文化、品味和内心世界的专门艺术，基本要迟至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刘半农、郎静山、刘旭沧等一批摄影大咖的出现，中国摄影和摄影艺术家才为人所熟知。显然，金仲廉不仅是中国摄影家这个群体中的先驱和健将，而且要比他们早了整整20年。

这批珍贵照片实物的“披露”，不仅让世人认识了摄影家金仲廉和金氏摄影家群体，也必将会为中国摄影史补上重要的一页。

茗上漫笔

墙门堂

郑祖欣

湖州城北门大通桥堍下，有座看似寻常的徽派建筑——“幸福街25号”墙门堂。听老一辈人说，这片青砖黛瓦的民宅，鲜有人知曾是香火鼎盛的大王庙。

从清代庙宇到近代民居，从动工拆除到突然叫停……如今的墙门堂只剩半截残躯，默然矗立桥堍。斑驳的砖瓦间，仿佛封存着一段无人诉说的沧桑往事。

墙门堂的门牌几经更迭。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大通街36号，后改为幸福街125号，最终定为幸福街25号。1961年我家迁入时，庙宇格局已改。1964年笔者在此出生，亲历了它从完整到残缺的变迁。

这是一座三开间、两进深的砖木二层大宅。粉墙黛瓦，马头墙高耸，乌漆大门配铜圆环。门厅铺水磨青石，两进之间是封闭的天井，内有清代石碑、排水沟和长条洗衣台。早年东西厢房相连，天井四周可通行，俗称走马楼。

老邻居冯世荣整理过一份材料，详述这座徽派建筑的外观结构、周边环境及时代演变。

早年西厢房有一门，通往西面的大花园，约千余平方，1948年出生的世荣和哥哥姐姐、小伙伴在园中捉迷藏、抓小虫，玩得不亦乐乎。园中古植颇多，一棵老榆树，树身粗壮，两个人围抱不牢，还有柏树、黄芽树、梧桐树等。花园匠心独运地布置着雕花石桥墙、月洞门和磁花格窗，精巧的园林建筑掩映在繁茂的花木之间，幽雅而迷人。蜿蜒的园中小径，全是鹅卵石铺就，行走其上稳当舒适，即便是雨天也不打滑。

东厢房也有一门，通往东边的总管堂——三间平房，一个前院，供着总管菩萨。

总管菩萨是管大王菩萨的吗？冯家爷爷曾是庙内私塾工役，一家人是庙里的“独家门”，但冯家儿女也讲不清楚总管菩萨和大王菩萨的子丑寅卯，只说大王菩萨很威严，端坐莲花台上，高约三米，另有七八座其他菩萨。

大王庙曾以“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闻名。骑马墙高峻雄峙，防火防风。花格窗镶蚌壳靛壳，透光柔和，贝壳表面带有天然弧形纹路，在阳光下折射出珍珠样的光泽，颇具装饰性。上世纪五十年代，统一改为木制玻璃窗。

传说大王菩萨“显过灵”。1937年日军一把火烧掉庙前大戏台，总管堂也着了火，“大火烧到大王庙这里，就是东边楼梯上去，有个边门（木门），放把油纸伞的地方，竟神奇地熄灭了。”冯世荣转述他老父亲的话。那座巍峨的戏台，每逢佳节盛会，台上锣鼓喧天，台下熙熙攘攘，承载着无数欢声笑语，就这样在熊熊火焰里化成灰烬……

大王庙后原有一条小河，属龙溪河支流，从大通桥旁进入，沿城墙从汇通桥处，汇入霅溪。孩子们常在此游泳摸鱼。河对岸是鲍家墩，由小木桥连接。

新中国成立后，小型宗教场所多被征用，大王庙先由米业公会入驻，菩萨退居后进。1953年米业公会解散，前一进空置。1954年湖州丝厂扩建，征用及家湾居民用地，拆迁户陆续迁入。随着许家、周家、邱家、程家和傅家的入住，大宅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许和尚是上海请来的湖籍保全工（也叫外国铜匠），育有五男四女九个孩子，住第一进楼上。其长子阿财技术精湛，人也清高，婚后搬进第一进底楼东边间——原来米业公会办公室，装司百令锁的地板房。

周家先生大名周起南，杭州人，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小说《红岩》中多次提及的长江兵工总厂，原型是重庆的兵工企业，抗战时生产了全国六成的武器，周先生就是其中负责发电的工程师，后应私营电厂老板聘请来湖就职。

阿紫娘妈分到后进楼上大间，她孙子傅金根要结婚，原供奉的菩萨被移至花园平房，大王菩萨的位置后来成了周家厨房。

1955年环城北路改建，城墙拆除，大王庙花园被征用建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河填平建水产仓库，木桥拆除，总管堂部分被拆，鲍家墩通路形成。

花园里风光不再。园中大树多在“大炼钢铁”年代和“三年困难时期”被砍伐，青年公园（现在的莲花庄公园）扩建时仅存的黄芽树也被移走，只剩冯家栽的梧桐树。

随着朱家、我们郑家、刘家、曹家等陆续迁入，走马楼砌隔断墙，天井搭搭屋，大王庙痕迹几近消失。大门上“米业公会”字样亦被铲，改为“向阳院”。

“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文革”……这个墙门堂穿越历史风雨，见证了那一段段不平静的岁月。记得，有人受过运动冲击，有人吃过冤枉官司，“破四旧”时红卫兵砸毁菩萨，大王菩萨腹内的铜制五脏六腑亦被毁。

那些面孔与旧物，至今历历在目。

印象最深的是世荣父亲，邻居们都尊称他“冯先生”。他是湖州东门外旧馆镇冯门埭村人，幼时随父从四川归湖，曾在大王庙私塾读书。老先生热心公益，在北门一带颇有名望。他让弟弟妹妹都读书——弟弟小他八岁，抗战时随湖州中学撤至贵州，后考入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第三钢铁厂技术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被安排进湖州米厂财务科做会计，生活还算顺遂，因被人揭发当过旧社会的保长、镇长，从此从受人尊敬的云端跌落。后他带着小儿子回老家务农，1974年病逝，终年62岁。

有些事，想来真是唏嘘！就像被剪断的蚕丝，再怎么接，也绕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当然，记忆中更多的，还是墙门堂生活的欢声笑语、家长里短。最热闹时，墙门堂住了十户人家，有电影《七十二家房客》的烟火气。墙壁是木板的，没啥隐私可言，逢年过节偶尔摆个大圆桌聚餐，俨然是热闹的一大家子；邻居如走马灯般更替，家搬去广州，邱家搬到陈家，朱家搬到邱家；周家有个女儿送了另户冯家，傅家小女儿和许家小子还是同一个奶妈带大的……我们这辈人渐渐老去，陈年旧事却恍若昨天。

1989年，大通桥改建的轰鸣声惊醒了沉睡的墙门堂。那座五孔石拱桥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可以骑自行车的水泥平桥。为了给新桥引道让路，墙门堂的前一进房屋被拆除，但不知何故，工程突然叫停，墙上留下大大的两个字：“保留”！

2003年，政府征用土地，墙门堂最后几户人家相继迁出。又是20多年飞逝。残存的墙门堂，如今依旧矗立在大通桥堍，砖瓦日渐剥落，木构件渐渐腐朽……“大王庙”“墙门堂”连同我们对这里或美好或辛酸的记忆，也许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但“保留”两字，也让我们心中一直保留着别样的期待。